

范學

論文集

下冊

范學論文集 下冊

統 籌：景范教育基金會
出 版：新亞洲文化基金會有限公司
贊 助：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青山道 489 號香港工業中心 A 座 6 樓 6 室
電 話：(852) 2745 1888
傳 真：(852) 2785 8375
E-mail：jingfan@newasiabooks.com
國際書號：ISBN 962-8236-26-1
© 新亞洲文化基金會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 年 3 月香港初版

目錄

下冊

慶曆新政及其對我們的啟示

汝 信先生 一

當代社會學者

窮變通久——一代純儒——剖析范文正公的易學思想

關 中先生 一三

當代政治學者

情深與境闊：范仲淹范成大詞對讀

喬 力先生 二一

曲阜當代學人

范文程與清初封建社會秩序的重建

張士尊先生 六四

清史研究學人

范仲淹的「憂樂」思想及其實踐

朱 紅先生 七九

桐城文史學人

范、曾二公師生關係考信錄

王更生先生 九〇

文史研究學人

法度所以示信——范仲淹法律思想初探——艾永明先生 一二六

范仲淹賦文學之研究——曹順慶 李凱先生 一五二

范仲淹與尹洙——高宗欣先生 一八一

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劉德清先生 一八五

剛柔相濟，撼人心魄——范仲淹詞作試析——朱新敏先生 二〇九

再論三代先賢人間正道——范章先生 二三一

讀《宋史·范仲淹傳》對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官制的認識——唐德剛先生 二八七

出版人——范止安先生簡介——景范教育基金會秘書室 三五六

慶曆新政及其對我們的啟示

汝信

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是對中華民族作出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在經濟建設、教育、軍事、文學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可謂功垂千古。同時他又是一位勇於革新的傑出的改革家，他所推行的慶曆新政雖然未獲成功，但我們評判歷史人物切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慶曆新政為隨後的王安石變法開闢了道路，我們今天閱讀和研究有關這次改革的歷史資料時，仍能從中獲得有益的深刻啟示。

一、推行慶曆新政的緣由

在中國歷史上，宋王朝並不是一個國力強盛的朝代。自從宋太宗趙光義征服北漢，最後統一中國，結束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以後，國內外麻煩不斷，問題成堆。到北宋中葉真宗、仁宗執政，雖然還算是社會保持相對穩定的所謂

「承平」時期，但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潛在的危機開始顯露，表面上似乎還能維持統治的局面，實際上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卻已直接威脅到政權的鞏固。

當時中國國內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并和農民貧困的問題。北宋初，土地兼并現象已相當嚴重。據史料記載，太宗時土地佔有不平衡造成農村貧富差距的擴大，「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錫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長編》卷二十七）。到仁宗時，情況更進一步惡化，嚴重到「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的地步（《宋史·食貨志》上一，《農田篇》）。可是沉重的賦稅負擔卻主要落在少地或無地的農村人口頭上，因為當時的官僚豪紳大地主階層都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負擔，或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這就造成了大批貧困農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甚至被迫揭竿而起，反抗朝廷。自北宋前期到中期，農民起義不斷，較著名的有王小波、李順為首的農民起義，王倫領導的士兵起義，湖南瑤漢人民起義，以及陝西張海、郭邈山領導的起義等等。這些起義使宋王朝當政者十分恐慌，以為「天下之憂恐自此

始」，調集大量軍隊，費盡心機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在對外關係方面，宋王朝也一直處於軟弱和不利的地位。北方有契丹貴族統治的強大的遼國，虎視眈眈，企圖南侵。宋廷為了收復被遼國侵佔的燕雲十六州，曾多次用兵，均告失敗，後來不得不於公元一〇〇五年和遼國在澶州簽訂了屈辱性盟約，即所謂「澶淵之盟」。宋朝為圖一時的安寧，不惜賠款媾和，每年向遼國納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從此開了賠款之先例，以後遼國動輒以武力相威脅，進行勒索，要求增加賠款，成為宋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繼遼國之後，西夏又在西陲崛起，公元一〇三二年黨項羌首領元昊登位後改變了與宋朝和平相處的局面，正式立國稱帝，向外擴張，對宋朝形成了新的威脅。慶曆年間，西夏經常對宋朝發動戰爭，宋軍屢遭失利，最後雙方妥協媾和，宋朝又以每年向西夏賠款了結。因此，當時的宋王朝既有內患，又有外憂，一方面要應付國內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又要防備強敵入侵，可以說是內外交困，陷於積貧積弱的處境。

面對這樣險惡的局勢，宋政府充分暴露出它的低效和無能。北宋建國伊

始，為了防止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割據局面的重演，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可以由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直接行使權力。在政府內部也設立多種機構和官職，互相分權制衡，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在軍事上，北宋仍沿用過去的僱傭兵制度，但為了控制兵權，經常調動軍事將領，更換部隊駐地。這些措施雖加強了皇權，卻造成了政府的低效率和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由於實行恩蔭制度，貴族官僚子弟享有當官的特權，致使冗官泛濫，官員素質下降。軍隊人數激增，由宋初的約二十萬人增至仁宗慶曆年間的一百二十五萬人，但冗兵日多而戰鬥力不強，軍費開支竟佔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冗官、冗兵大量增加，使財政出現嚴重危機，陷於入不敷支、捉襟見肘的困難處境。

宋仁宗趙禎原本不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英明皇帝，然而迫於當時的形勢，他不得不考慮另謀出路以維持宋王朝統治。慶曆三年，他起用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力主革新圖強的有識之士主持朝政。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仁宗要求他和韓琦、富弼等人提出當前對策。范仲淹等針對時弊，寫成《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奏上，提出了改革綱領和方案，經仁宗批准後開始實

行。這次改革在慶曆三年至五年間進行，故稱「慶曆新政」。

二、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和實施情況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范仲淹開宗明義說明宋朝建國以來八十年，積弊太多，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綱領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作為當時儒學的傑出人物，范仲淹借助於儒學經典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據《宋史·范仲淹傳》，「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所以他以《易》為根據去闡明必須進行改革的道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

當時的范仲淹是一位富有二十八年從政經驗的政治家，他知道「久安之弊，非朝夕可改」，改革的難度很大，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提出了十項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精簡機構，澄清吏治。這方面的措施有：「明黜

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也就是說要大力改革官吏任免制度，加強考核，官員升降主要應根據其政績，看實效如何，而不能用所謂「磨勘」的老辦法，不管政績如何，照常是文官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要嚴格限制貴族官僚子弟靠恩蔭制度當官，防止那些濫竽充數的冗官泛濫成災。要改革考試，注重真才實學而不強調詞賦。要舉薦人才，選拔賢能，慎重選擇各級主管。以上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是慶曆新政的重點，其目的是要整飭吏治，整頓官僚機構，精簡冗員，改變當時官僚們因循苟且、無所作為的政治風氣，根據政績提拔重用一些能幹的人才，以改進官僚素質，提高工作效率。這些改革措施經宋仁宗批准，並詔令天下，開始實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經濟方面的改革措施有：「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公田（職田）是分配給各級官吏的土地，其所得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公田的控權掌握在大官僚手中，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影響官僚隊伍的穩定，不能廉潔奉公，貪污枉法，侵害老百姓利益。范仲淹主張限制公田數額，合理分配給各級官吏以養廉，這不僅是一項經濟改革措施，而且也有利於廉政建設。

「厚農桑」則體現了以農為本的思想，認為「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主張興修水利，大力發展農業。「減徭役」的用意則在於減輕農民的勞役負擔，合併一些州縣，使精簡下來的人員「各放歸農」，以加強農業生產。這方面的改革措施也由宋仁宗同意後實施。

第三、軍事方面的改革有：「修武備」。鑒於邊患嚴重，為補充軍力之不足，范仲淹建議恢復唐代的府兵制，寓兵於農。這項措施未被仁宗採納，未能實行。

第四、加強法制方面的措施有：「覃恩信」、「重命令」。這是針對當時各級官僚機構中普遍存在的對中央的決定陽奉陰違的惡劣作風而制定的。范仲淹指出，過去中央一些決定如「寬賦稅、減徭役」，下面都「未嘗施行」，「盡成空言」。為了糾正這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風，要對那些失職的官吏追究責任，加以懲辦。同時，制定法令必須慎重，有法必行，不能隨便更改。這些建議也被仁宗所接受。

慶曆新政實施初期，由於得到仁宗贊同，陸續頒佈好幾道詔令，將以上這

些建議付諸實行，開頭還比較順利。但在新政各項政策的實施過程中，由於觸犯了貴族官僚們的既得利益，越來越遭到有錢有勢的權貴和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新政的第一道詔令，就是責成中央有關部門對各路官吏嚴加考核，凡不稱職者一律加以撤換。這就直接威脅到尸位素餐的廣大官僚們的切身利益。當時富弼對此措施有所顧慮，擔心會引起官僚階層的不滿和反對，曾勸解說：「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而范仲淹則態度十分堅決，說出了擲地有聲的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以後陸續頒佈的幾項詔令，也無不遇到強大的阻撓和非議，實際上難以落實和貫徹。強大的反對派採取造謠中傷的手法，誣陷范仲淹等改革派，把「朋黨」的罪名強加於改革派。據《宋史·本傳》記載：「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乃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宋仁宗本來是出於無奈才實行新政，他對改革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的。在強大的反對勢力的影響下，他轉變態度，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韓琦等人

相繼調離京城，並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之職。新政只實行了一年多，到慶曆五年初即宣告夭折。

慶曆新政雖遭失敗，但改革思想仍繼續發揮影響，正如陳亮所說：「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陳亮集》卷十二《銓選資格》）。它為宋代更大規模的改革——王安石變法作了思想準備，在中國政治改革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慶曆新政對我們今天的啟示

慶曆新政距今已一千多年，可是它的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天中國的改革來說，仍有可資參考的重要意義。

首先，中國的改革家應具備范仲淹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學習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那種大公無私的精神，要像他那樣體察民間疾苦，為人民做好事、辦實事，如築海堤、修水利、振興教育、鞏固邊防等等。一個真正的改革家，就要扎扎實實地工作，為廣大人民謀福利，而不能誇誇其

談地講空話，開空頭支票。

其次，作為一個改革家，要有范仲淹那樣的大智大勇的高尚品德，不僅要有洞察時勢的遠見卓識，而且要有排除萬難、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任何一次重大的改革，都會導致利益格局的調整，觸犯某些人、某些階層或集團的利益，因此必然會遇到各種阻力和反對，不可能一帆風順。只有不畏艱險，不怕得罪少數特權人物，不計個人得失，才能真正進行改革。當然，改革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改革家的個人才能和品格，而且取決於客觀條件，尤其取決於能否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慶曆新政失敗的教訓在於，改革主要依靠皇帝個人的意願和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官員的支持，缺乏群眾基礎。這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所限，不可苛求於前人的。中國歷史上多次政治改革的失敗，其主要原因在此。

再次，范仲淹發動慶曆新政的指導思想是「窮則變」，反對保守，反對墨守陳規、故步自封。他認為，情況變了，發生了困難和新問題，就不能沿用老一套的辦法去應付。他的這種革新精神是十分珍貴的，雖然和我們今天提倡的

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改革精神不可同日而語，但思想實質是相通的，應視作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遺產來加以繼承發揚。

最後，與范仲淹的時代相比，中國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慶曆新政所涉及的某些問題對我們今天卻仍有現實意義。例如，當前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各級政府都普遍存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冗員甚多、效率不高的問題，在幹部任免和人事制度方面不正之風盛行，利用特權，任人唯親者有之，跑官賣官，貪污行賄者有之，飽食終日，敷衍塞責混日子者更不在少。精簡機構，整頓吏治，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仍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之一。又如，發展農業和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也是經濟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國是擁有十二億人口的大國，只能依靠自己養活自己，農業始終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在農民仍佔人口大多數的情況下，必須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裕起來，才能真正開拓和發展國內市場，使整個國民經濟得以高速、健康、持續地發展。再如，當前我國實行以法治國的國策時，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力，甚至有的國家機構和執法部門也目無法紀，明知故犯，或陽

奉陰違，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錯誤態度。凡此種種，說明范仲淹當時推行慶曆新政所提出的一些糾正積弊的措施並未完全過時，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借鑒。作為一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的英名將永垂青史。